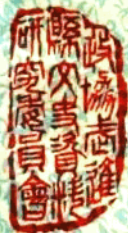


1011

武進文史資料 第七輯

第七輯



目 录

古今人物

史良事略	县志办 (1)
巢玉堂烈士	郑松亭 (11)
教师吴千庭	谢良诚 黄铨林 (16)
昆虫学家吴福桢	何 平 (21)

政治风云

北伐战争在武进	丁中秋 (25)
武进县最早的国民党组织	萧 吾 (35)
武进县国民党沿革	冯悦群 (40)

工商经济

许冠群与新亚药厂	祁和鸣 (48)
大商人蒋彦生的兴衰	焦溪乡志办 (73)

教育事业

民国六年的一次学务改革	徐维镛 (77)
前黄公学	冯秋良 (85)
潜化中学创办记	肖石光 (88)

武进胜迹

青城的盛衰	陈秋樵 (91)
-------	----------

何墅八景……………城上乡志办（93）

社会变革

武进的人口增长与分布……………过鉴愚（99）

南夏墅农村改进试验区的回忆……………钱伯显（105）

海外来稿

中医针灸在美国加省立案经过……………卞伯岐（134）

质疑·订正·补充

李公朴出生地考……………吴之光（141）



史良事略

县志办

杰出的爱国民主战士、著名政治活动家和法律学家、中国妇女运动著名领袖之一、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史良。一九〇〇年三月二十七日，出生于江苏武进县城观子巷（今常州市）。父亲史子游，设馆授徒，收入微薄，家庭经济困难，生有子女八人，竟有三个夭折。史良的母亲十分贤淑，在艰难的环境中主持家务，把她抚养成人。史良幼时由父亲启蒙，十三岁时才进武进县立女子师范附小读四年级。直至大姐有了工作，家庭经济情况有所好转后，遂进武进县立女子师范读书。她学习刻苦，爱读进步书刊，受到新文化的启迪。思想敏锐，意志坚强，长于雄辩，敢于斗争。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消息传到武进城乡，各界人士群情激奋，纷纷响应，迅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浪潮。当时她是女师的学生会负责人之一。带领学生上街宣传和游行，成为常州学生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人。女师学生的斗争尤为突出，引起了当局注意，勒令该校停办，并把告示贴在校门口。史良撕下告示，带领全校同学先找县劝学所（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局）所长徐化吾交涉，又逼迫徐化吾同去县衙门找姚

知事。衙门里的人推说姚知事不在，大家等了好久，恼怒之下，把公堂的长桌掀倒，审签撒了一地。史良大声呵责，并带领大家冲进里面去。这时徐化吾连忙出来拦阻，要他们派代表进去。史良作为学生代表进去谈判，片刻出来说：“他们说请我们吃了晚饭再商量。”但吃过晚饭后仍无眉目。直至九点多钟，大家商量暂时回去。当晚十点多钟，当局偷偷地把史良抓到衙门。姚知事问她：“你们这种行动，是受谁的指使？”史良回答说：“是我们大家的决定。”姚又恐吓说：“你不说，我把你关起来。”史良毫无惧色地说：“要关就关好了。史良料姚知事不敢这样做，决定趁此机会坍塌他的台。她说：“有话不可以白天讲吗，为何半夜三更把我抓来？我是一个女子，半夜里被你们抓来了，算什么呢？”史良要他们等到白天送她回去，还要坐着轿子，并且要走大街，送到家门口。当局害怕酿成学潮，第二天清晨，只好让史良坐着姚知事的包车，把她送到家里。这件事轰动了整个武进县城，打击了封建统治者的反动气焰。

一九二三年，她考入上海法科大学，攻读法律。在校期间，曾多次参加学生运动。在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中，她积极参加了示威抗议活动，被反动当局抓去关了一天。获释后，出版《雪耻》杂志，自任主编，坚持宣传活动。

一九二七年，她从法科大学毕业，一度找不到适当的工作，不得不放弃法律专业，到南京政治工作人员养成所任指导员。因反对国民党的专横，被指控为共产党嫌疑而被捕入狱。与她同时关押的有不少共产党员，他们的革命斗争精神，引起了她的同情。史良被关两个多月，经蔡元培等营救，始免于难。这一经历，使她认识到了旧社会的黑暗，对国民党产生了

极大的反感。后在江苏临时地方法院任书记官，因曾入狱，而被解职。

一九三一年起，她在上海专任律师职务，后来成为全国闻名的大律师。在漫长的律师生涯中，她不顾环境险恶，敢于挺身而出，坚持正义，主动为受冤屈的民众辩护，为保障妇女和儿童的权益而斗争；冒着生命危险为受迫害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四出奔走。一九三二年，共产党员邓中夏被国民党反动派非法逮捕，她奋不顾身，想方设法进行营救。同年夏天，共产党员任白戈被国民党逮捕，经过她紧张的活动，终于使任白戈得以开释。一九三四年又发生了共产党员熊氏兄弟被捕的案件，他们是被叛徒出卖的，若是当面对质，熊氏兄弟必无生理。她接受承办此案辩护律师后，找到了告密人的线索，随即秘密地通知地下党组织，果断地清除了这个叛徒。法院审理时，由于没有人证，只得以查无实据了结此案。在这过程中，史良结识了宋庆龄，当时宋庆龄等发起组织了“民权保障同盟”，并任同盟主席；同盟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营救被国民党迫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从此她和宋庆龄成为亲密战友，又和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的互济会建立联系。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上海地下党指定互济会一个成员到史良的律师事务所内任“帮办”，以互相配合进行革命活动。

史良积极从事爱国救亡运动是从三十年代开始的。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制造“九·一八”事变，使她深刻认识到爱国救亡运动的刻不容缓。次年“三八”妇女节，上海各界妇女举行集会，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在声讨会上，混进了不纯分子大唱反调，鼓吹“妇女只要做好家庭主妇，毋须过问政治”的谰言，与

会者听了怒不可遏，史良当即跳上台去，加以痛斥：“今天中国妇女的最大责任是救国而不是持家，国且不保，何以家为？”她的讲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会后进行游行，上海市政当局竟然出动军警加以阻拦，用木棍殴打游行群众，许多群众被打伤。这是史良离开大学以后第一次在革命的熔炉里经受锻炼和考验。

一九三五年前后，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向我华北进逼，妄图併吞全中国。国民党政府一面推行对日不抵抗政策，一面加紧进行内战。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上海妇女界救国会首先成立，史良是发起人之一，并被推选为理事。接着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史良被选为执行委员。



史良在群众集会上

一九三六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气焰更加嚣张，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五月三十一日全国各界救国会成立，选举宋庆龄、沈钧儒等四十余人为执行委员，史良是其中重要一员。七月，国民党召开三中全会，大家对会议的动向都很关心，为了推动这次会议能在抗日的步骤上更进一步，而不致走向反面，史良同沈钧儒、章乃器、沙千里作为救国会的代表，到南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史良等回到上海，开展募捐活动，接触群众，开展了大

规模的爱国救亡运动。九月，为了纪念“九·一八”事变五周年，上海市人民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游行，遭到国民党军警的袭击；史良急切地站到路旁的人力车上，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致对外！”等口号。国民党军警向她冲来，她被打得遍体鳞伤而致咯血，被一群工人救出，送往医院急救。十一月十二日，救国会上海静安寺路举行孙中山七十诞辰纪年大会，热烈赞扬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同时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的“攘外必须安内”的反共政策。十一月十九日，救国会主持为鲁迅举行隆重的葬礼，目的是发动一次群众性的示威游行，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向新的高潮。送葬的仪式变成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史良和救国会的其他领导人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度恐慌。十一月二十二日深夜，国民党当局悍然逮捕了救国会中的六个主要领导人，立即移解苏州监狱。当时史良机智地躲过军警的视线而脱逃，利用这一时机争取舆论，组织发难，待斗争组织就绪后就自动“投案”为“爱国有罪”坐牢。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救国会“七君子”事件。她在法庭上与国民党法官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直至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日战争爆发，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声援声中，得力于中共中央和爱国民主人士宋庆龄等人营救而出狱。

史良等恢复自由后，即和沈钧儒等一行赴港澳等地宣传抗战。不久，国民参政会成立，她以救国会领导人身份参加国民参政会任参政员，为争取国民党政府实施民主和妇女参政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抗战开始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对进步力量更加仇视，矛盾激化起来。

一九三九年，国民党以精神动员会的名义发出了四个秘密

口号：“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阴谋打击一切抗日民主力量。一九三九年底到一九四〇年初，国民党反动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他们破坏团结，坚持独裁的反共反人民的面目进一步暴露。中共七位参政员提出十二条抗议书，愤而拒绝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会议。史良和救国会的几位政参员也随同退出参政会，积极支持共产党的严正立场，抗议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她继续和救国会的同志一起，积极参加争取民主，反对独裁，坚持团结，坚持抗战的爱国民主运动。抗战初期，史良曾担任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委员兼联络会主任。这个组织是妇女界的统一战线组织，指导长是宋美龄，宋庆龄、邓颖超等也被聘请为委员。这个组织也确实在支援前线、宣传抗战等方面做过一些有利抗战、有利于人民的工作。有一次，有四百多个流亡女学生，被蒋介石的亲信陈诚收罗组织一个战时服务团。史良等设法把这个服务团弄到妇女指导委员会这方面来，改变了这批流亡女学生的政治面貌。有一次，宋美龄出面，邀请史良共进午餐。蒋介石作陪，席间对史良说“国民党需要增加新的血液，你为什么不加入国民党一道把它进行一番改革呢？”史良不为其权势和甜言蜜语所惑，拒绝参加国民党。

抗战期间，史良曾任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常委，中国妇女慰劳总会理事，在团结各方面力量支援抗日以及训练妇女干部等工作，始终身体力行，站在抗日最前线。

一九四二年，史良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九四四年九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史良被选为第一届中央委员并担任民盟重庆市委组织部长。民盟成立以后，吸

收了不少进步知识分子参加，创办了《民主》周刊和《民主报》，宣传民盟的政治主张；创办社会大学，史良是校董会成员之一。同年十月，发表了《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这是民盟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文件，它把一般地要求民主的政治观点提高到具体的政治主张，反映了当时广大人民的要求，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赞同。

抗日战争胜利后，史良任中国民主同盟参加旧政协代表团的顾问。她和民盟所有代表团成员一道，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反对内战，同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旧政协会议以后，史良回到上海，继续进行律师业务。

一九四七年十月，国民党政府悍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迫使民盟停止公开活动。引起民盟盟员和广大知识分子的极大愤慨。在当时形势的推动下，民盟一届三中全会于一九四八年一月在香港召开，决定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成为一支推翻蒋介石独裁政权和驱逐美帝国主义势力出中国的重要力量。当时史良在上海，她根据民盟总部决定，在沪建立了民盟华东执行部，并担任执行部主任。在白色恐怖下，从事民盟的地下活动，勇敢地和国民党反动势力明里暗里拼，工作可谓艰巨。一九四八年六月，国民党政府逮捕了参加抗议“美国扶植日本”示威游行的学生。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扬言要传讯上海学联负责人。上海学联为了抗议这种无理迫害，就在交通大学广场举行万人公断大会，邀请史良、张志让、马寅初等著名法学家和民主人士出席公断。史良在大会上即席发表演讲。她对学生们说：“你们是爱国无罪的，政府传讯你们是非法的。我查遍全世界的法典，行政成员是无权传讯公民的，吴国桢市长要传讯

你们，他是先犯了恐吓罪；他如果真的传讯你们就犯了渎职罪，他们如果要抓你们，我和你们一起坐牢。”她那大义凛然，慷慨陈词的讲话，不但对上海学生，也是对广大爱国公民的极大鼓舞，使反动派闻风丧胆。

上海解放前夕，白色恐怖笼罩全市，当时的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发出密令要不择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五月十日深夜，国民党反动军警和便衣特务搜查了她的住宅和她的律师事务所，抓走了她的女秘书。在这危急时刻，上海解放了，史良免遭毒手。



五十年代史良出访
回国与宋庆龄交谈

一九四九年五月，史良离开上海到北京，和民盟总部的同志会合。九月二十一日，新政协会议开幕，她以民盟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会议。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她参加了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她被任命为第一任司法部部长和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她为新中国的

民主与法制建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我国妇女走上政治舞台，做出了重要贡献。她历任全国政协第一届至第五届常务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她是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至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她历任民盟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副主席等职。她还担任过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的领导职务，先后

被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副主席。

“文革”期间、史良曾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幸而得到周总理的保护。即使在“四人帮”肆虐、乌云压城时刻，她仍然对党和国家充满信心和希望。粉碎“四人帮”以后，她热烈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衷心钦佩党中央拨乱反正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拥护党中央实行改革和开放的决策。特别她在恢复和健全民主与法制工作上全力以赴。也成为加强民盟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开创民盟工作的新局面，为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支柱。

史良的一生，是不断追求进步、不断追求真理的一生。她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祖国和人民。在近二十年的律师生涯中，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劳苦妇女辩护伸冤，为争取妇女的一切正当权益而不懈努力。她年在八旬，仍然抱病坚持工作。一九八三年底，民盟中央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她坚持参加大会开幕式，一口气读完讲稿，使与会者莫不钦敬和精神振奋。早在她担任司法部长时，事必躬亲，特别重视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而专设信访办公室，经常亲自批签信件，并亲自查核落实工作。

史良人在外，但经常关心家乡的一切，常州的民盟组织就是她发展起来的。一九五六年，她同李公朴夫人张曼筠一同回到故乡常州，亲自参加李公朴烈士遇害十周年纪念大会，以李公朴烈士的伟大人格发表充满激情的讲话而感人肺腑。一九八二年冬，她为《武进县志》撰写了“编好县志，造福桑梓，教育后人”的题词。一九八五年国庆前夕，又应民盟常州市委之邀，为节日题写“振兴中华，建设常州”的祝词，在文后的“我谨在此寄语故乡人民，父老兄弟，但愿人心齐，共受党领导，开放加改革，奋发更争光！”寥寥数语，尤使故乡人民倍感亲

切和深受教育。

史良的高贵品质和历史功绩，将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



巢玉堂烈士

郑松亭

巢玉堂，江苏省武进县万绥镇严桥村人，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生于一个贫农家庭。有兄弟四人，玉堂为长，他的弟弟炳桂、国良、国英都是种田为业，他们各有平房一间，田二、三亩。玉堂家中没有房子。在二十五岁时，和万绥郑塔里郑九英结婚，从此，就住在他的岳父家。生二子二女，长女月娥，次女喜来，三子钟岳，四子孝忠。

巢玉堂八岁时进严桥村私塾读书。由于家庭贫困，他兄弟四人中，三个弟弟都没有读什么书，只有巢玉堂读了十一年书，读完了《四书》、《五经》。文墨秀丽，才思敏捷。后经人介绍在郑塔里做小学教师。抗战前在武进县漕桥区任区长助理，并参加了国民党。

巢玉堂为人正直，性情宽和，文静潇洒，身材魁梧，体格丰满健壮，有正义感，思想较进步，是国民党左派。虽在国民党区公所任职数年，但比较廉洁，仅靠自己的薪水养家度日，并无资产和积蓄，受到乡邻们的尊敬。在玉堂逝世后，他的家属连房子也没有，只能住在严桥的两间旧公房里，生活极其困苦，他的子女都无力读书。不久，他的妻子郑九英，由于贫病交迫，也去世了。

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八·一三”上海抗战后，巢玉堂回到家乡严桥村。十一月二十九日常州沦陷，巢玉堂避战乱于扬中县老郎街附近乡下，两星期后，仍回到严桥。

村。因为家中没有房子，就住在土地庙公房里。此时巢玉堂目睹日寇对我国的野蛮蹂躏和疯狂烧杀，激起了他无比的仇恨和强烈的抗日救国决心。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他毅然在家乡号召乡民，拿起武器打击日本侵略者，保卫家乡，组织抗日的武装，得到了乡民们的响应。一时投奔者甚多，很快就组织了三十多人的游击队基干队伍，有长短枪十多支。枪的来源，主要是罗桥头的何纪火，东庄的恽祖荣，埭头上的祁乾林，祁庄的张永泉等支持购买的。巢玉堂自任队长。这支游击队分二个班，一班班长张根保，二班班长张松洋，驻扎在严桥、礼巷里一带，维持地方治安。

一九三八年一月初，小河的谢国良（当时的游杂武装小头目，后投靠张少华）来向巢玉堂“借枪”，采取突然袭击，想把巢玉堂的游击队吃掉。玉堂闻讯，立即带着队伍撤走，结果把他妻子郑九英、儿子巢钟岳抓去，想以此作为人质，要玉堂交出他的游击队的枪支，遭到巢玉堂的拒绝。后经小河的何纪顺干预，才释放了巢玉堂的妻子和儿子。

巢玉堂经此变故，认识到要组织游击队抗日，立住脚是不容易的，必须联合起来。他思考再三，没有后退，决心继续干下去。于是他就主动跑到访仙桥的倪山，找管文蔚联合，接受管文蔚同志的抗日自卫团领导，管文蔚任巢玉堂为武进县西夏墅抗日自卫团团长。从此，这支游击队发展很快，万绥一带的青壮年踊跃参加，到一九三八年四月，已发展到有六、七十人枪的基干队伍。他们进行训练，在奔牛至孟城的交通沿线，开展游击活动，发动群众，从罗墅湾至石桥一带，破坏公路桥梁，收割电线，使日军军车常常受阻，迟滞了日军的军事行动。有一次，在平塘村附近打伏击，打死了三个日本兵，缴了

三支崭新的三八枪。是年春夏，攻打并火烧罗墅湾日军据点，又配合管文蔚领导的抗日自卫总团，袭击了停在吕城火车站的日军军用列车，大大鼓舞了广大抗日人民。

同年二、三月间，江苏省江南抗日自卫总团，除建立武装外，决心建立自己的政府，将国民党旧乡保长制一律废除，由抗日自卫团代行政府职责，委任了丹阳、武进、镇江县县长，巢玉堂被委任为武进县县长。

一九三八年五、六月间，管文蔚曾派抗日自卫团二大队方钧部驻防严桥村，巢玉堂的抗日自卫团团部也设在严桥，后来方钧部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二支队离开严桥一带去新老洲，巢玉堂的抗日自卫团奉命将一个排由排长郑炳正带领编入新四军挺进纵队，巢玉堂从各村的自卫团中又挑选一批骨干，充实了队伍，仍保持了六、七十人的武装。

巢玉堂建立的这支武进西北乡的抗日自卫武装，一方面打击日寇，一方面维持地方治安。常州沦陷后，一些国民党的散兵和地方上的流氓结合，到处进行绑架抢劫，人心惶惶，自从巢玉堂建立了抗日自卫团后，打击了这些散兵和地痞流氓，人民才得到安宁。从此，他在武进西北乡，有了较大的政治影响。

事物的发展往往是曲折的，巢玉堂和他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也遇到了困难和曲折。巢玉堂曾多次受到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打击。但是他没有动摇，没有后退，他抗日救国的决心是坚强的，他接受共产党新四军领导的意志是坚定的。例如：在这支队伍刚建立之初，就受到小河的谢国良袭击，抓去了他的妻子和儿子，要他交出枪支，他没有屈服，继续坚持抗日斗争，并决心接受管文蔚同志的领导。后来他的队伍扩大了，在当地的政治影响也大了，成了管文蔚部“向东发展的依靠力量”了。

国民党反动军张少华，把巢玉堂视为眼中钉，搜罗了汉奸费炳夫、巢全虎等，出动了一百三、四十人，在一九三八年八月八日（农历七月十三日）拂晓，对巢玉堂部驻地严桥村进行突然袭击，经过激烈的战斗，巢玉堂率领他的部队突围出去了，张少华扑了个空。这些反动派恼羞成怒，挨家挨户搜查掠夺，放火烧了巢玉堂土地庙的住所三间，以及他的部队驻所土地庙后厝三间，烧了巢玉堂的警卫员巢丕显和他弟弟巢炳桂的房子二间，居民房子三间，共烧了房屋十一间，还打死了年近七旬的老人郑洪生和另一村民。

同年九月八日（农历闰七月十五日）巢玉堂的弟弟巢炳桂也被张少华派特务在万绥镇枪杀了。

巢玉堂经此沉重打击，也没有被反动派所吓倒，他慰抚受难的村民，掩埋了同志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

一九三八年九月初，他的部队在西夏墅西面的埂头上一带活动，又和下乡扫荡的日本鬼子打了一仗，给日军以很大杀伤，我自卫队员也伤亡邹沛成等七人。

苏南特委委员，宣传部长周苏平，于一九三八年十月到丹北，以挺进纵队民运科长的名义在丹北（包括武北）开展工作，曾约见巢玉堂，了解武进的情况，巢玉堂详细汇报了武进人民抗日斗争情况，以及当时各派势力的斗争，也谈了个人的经历。周苏平对巢玉堂的文静潇洒风度和才干，留下很好的印象。

一九三八年秋冬，丹北抗日局面迅猛发展，我军部队也发展很快，部队的给养就成为紧迫任务，从此，巢玉堂受命主要做政行、后勤支援工作，征收税收和钱粮，以保证新四军部队的供给。他和管文炳同志的联系就多了，他们建立了密切的工